

絕妙的數學家(十三)

矢野健太郎著

顏 一 清譯

二十五.(A.D. 亞歷山德魯夫 (A.D. Aleksdnrov, 1912-)

簡介：就我所知，在蘇俄，叫做亞歷山德魯夫的著名數學家有兩位。其一是拓撲學大師P.S 亞歷山德魯夫 (Pavel Sergeevic Aleksdnrov,1896-)，他和 H. 荷普 (Heinz Hopf, 1895-1971) 合著的「拓撲學 I」是非常有名的名著。另一位是在大域微分幾何學上留有許多業蹟的 A.D. 亞歷山德魯夫。他還當過史大林格勒大學校長。

1.沒有人跟蹤

1953年，在安利哥。 澎皮亞尼 (Enrico Bompiani, 1889-) 出主意之下戰後第一屆國際微分幾何學演討會在意大利舉行。研討會，並以別出心裁的方式進行：開會儀式在威尼斯，再來的會場是帕多瓦 (Padua) 大學，依次變換會場，最後在比薩大學閉幕。

我就是在那時和與會的 A.D. 亞歷山德魯夫教授見到面的。蘇俄還有其他數位數學

家來參加。不過我注意到奇怪的事。那便是：亞歷山德魯夫教授以外的蘇聯與會者後面都形影不離地有一名蘇聯人跟蹤著。亞歷山德魯夫氏則沒有。後來才聽說，怕他以外的數學家會有亡命之舉，所以各有一名監視者，而 A.D. 亞歷山德魯夫可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人，不用擔心這會事，也就不必有監視人了。

2. 花的精力能追回嗎？

1958年夏天，戰後第三屆國際數學家會議在蘇格蘭的愛丁堡舉行。會後有三個月之久，我應朋友 E.T. 戴維斯 (E.T. Davies, 1904-1973) 教授之邀，在南安布頓大學 (Southernpton Univ.) 當客座教授。

在這期間，亞歷山德魯夫教授以視察歐洲各大學的名義訪問過南安布頓大學。而戴維斯教授的專長跟他一樣，都是微分幾何學，又是數學系系主任，所以由戴維斯教授擔任亞歷山德魯夫教授的招待者。當時大學當局與戴維斯教授用儘心思，舉凡與亞歷山德魯夫氏有關的資料，不知在那兒，怎麼查到的，都寫成資料，放在戴維斯教授的口袋裡。比

如,有關文學的話題該談論誰的作品才好,有關音樂時又該以那些人的作品為討論中心等;又如亞歷山德魯夫教授的數學業績以外的興趣、嗜好等都巨細彌遺地滿滿記載在資料本上。

有一回,亞歷山德魯夫和我為主賓開過一次晚餐會。

這雖然是一般的說法,不過英國菜一向風評不怎麼好。如法國人稱裝生菜和肉的冷盤為「英國式冷盤」(assiette anglaise),這該是嘲諷「沒經過料理的菜」的意思吧?又把米煮成白飯端在盤子裡就叫做「英國式的飯」(du riz à l'anglaise),這也是諷刺「沒經過料理的飯」的吧。

據說在英國請客最考究的菜是盤子裡裝上一隻適度的鳥的料理。以亞歷山德魯夫和我為主賓的晚餐會中果然也出現了這樣的料理,可惜我忘記了名字,不過牠是一隻比鴿子稍小的鳥,這當然要使用刀、叉來吃,但是不知他們是怎麼料理的,我爲了要削下附在鳥身的少許的肉,用盡吃奶的力。我旁眼描一下隔座的亞歷山德魯夫教授,他雖然習慣以刀、叉用餐,看來沒有我那麼辛苦,可是好像也不是頂容易的。而亞歷山德魯夫教授也看出我爲了要吃這一隻瘦小的鳥肉苦鬥的窘狀,就以別人聽不到的小聲悄悄地跟我說:「矢野,你想,我們吃這隻鳥能夠換回我們爲牠所付出的精力嗎?」

這讓我覺得,這位身爲大學校長的亞歷山德魯夫教授可真淘氣哪。

3. Not at all (不客氣)

再一次我遇見這位亞歷山德魯夫教授是在1966年夏天在莫斯科開國際數學家會議的時候。

到了莫斯科,我才發現大學教授和學生雖然有不少人會講流暢的英語,但是旅館職員未必會說英語,如,旅館的升降機有位胖胖的老婆婆坐在椅子上操作,不過她只是按按鈕而已。我想上三十八樓,要按鈕,她推開我的手,不知叫些什麼,大概是說按鈕是她的工作,不要自己按,告訴她上那一樓就好。我沒法子,只好請教人家我房間號碼的俄語,再告訴她。

在餐廳也發生類似的情形。菜單上雖然寫著俄文和英文,但是用英語點菜,侍者聽不懂,如果旁邊有經理,他會聽懂,但是他不在就沒法子,只能用指頭指菜單中的號碼點菜。

有一個晚上我跟內人,還有一位從日本與會的 T 教授圍著一個桌子吃晚餐,亞歷山德魯夫教授從旁邊經過,我用眼睛向他打招呼, T 教授發覺了,對他說「先前真是謝謝!」,亞歷山德魯夫氏以瀟灑的手勢說:「Not at all!」就走過去了。

我在中學學到,別人說「謝謝」,回答「不客氣」要說成“Not at all”。但是美國人在這個情形之下通常會說“You are welcome”。所以我覺得到底還是在歐洲,通用的是英式英語。

這時候 T 教授說:「剛才在門口想問侍者一些事,但是不通,不知怎麼辦,剛好這位先生經過了,幫我翻譯。我以為他是一位經理,你也請他幫過忙嗎?」

我告訴他，「那位是史大林格勒大學校長的 A.D. 亞歷山德魯夫教授耶。」，T教授說他也真是的，竟把大人物看成經理輩人物。

二十六. 黃用誼

(Y.C. Wang, 1913-)

簡介:中國數學家，曾經留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E.T. 戴維斯教授處，專攻微分幾何學，再訪問美國各處大學後回香港，任香港大學數學系系主任多年，後為該大學榮譽教授。

他對東南亞數學學會的成立有功，所以也是該學會榮譽會長。

我在「快活的數學家」中，已經提過黃君的一些事，過後又想起另一些，就在這兒提一提吧。

1. 由太太開車子

黃君夫婦當然擁有很有派頭的轎車。不過，開車這一門事不是由他，而是由他太太。他只是坐在旁邊指使她「往這邊，去那邊」而已。黃君的太太是美國華僑，開車子很在行，多坡的香港街道還是跑得得心應手。

在香港或是日本難得看到由太太開車，先生坐在旁邊的情形，不過在美國我倒是見到幾對這樣的夫婦。這些人的太太的說詞是：「數學家駕駛的車子好危險，還能夠坐嗎？本來開車就相當危險，該十分留神才行，可是邊開車突然還想起數學問題，像：跑在前面的車子車號是不是質數這類問題，不出事才怪！想起坐由數學家開的車都會起雞皮疙瘩。

乾脆外子的接送由我來包。」黃太太也說類似的話。

在美國好像叫坐在後座而指使駕駛直走，往左，轉右的人為 back-seat driver，那麼黃君該稱做 side-seat driver 吧？

在美國聽過這樣的故事，先生是數學家，到大學的接送以及到其他地方開車的事由太太負責，太太後來懷了孕，肚子逐漸大起來，不過對開車還是沒有大礙。但是有一天，太太快要生產了，得趕緊送人到醫院。她從車庫把車子開出來，先生焦慮地坐在旁座。就這樣到了產科房，丈夫陪太太辦妥住院手續，還鼓勵太太要好好撐住，等到丈夫走到醫院門口，看到隨便停放在那兒的車子，這才為自己該怎樣回家，車子該怎樣開進車庫而傷透了腦筋。

2. 為什麼娶太太

我有點在乎這個故事對現今的年輕人是否有趣，不過既然也有「大男人宣言」的流行歌行道，我還是說一說吧。

1980年隔年開會的東南亞數學學會在香港舉行。我在那裡遇見了四十多年來的老友，在美國加州大學巴克萊分校的陳省身教授。

在這兒，我稍為交待一下。黃君的太太叫她先生 big Chinese husband。這位陳君可是在美國生活多年，從而成為恪守美國式禮節的典型美國紳士。

陳君跟我閒談時我告訴他，「我現在在收集一些無傷大雅的數學家趣事寫成『快活的數學家』，不知黃君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陳君想了一下，說，「有，有過這麼一回事」就告訴我下面的事。

那時候陳君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席而黃君夫婦去探訪芝加哥大學。有一天陳君夫婦陪黃君夫婦遊覽芝加哥市，那天早上很冷，四個人人都穿著厚重的大衣，但是近午太陽出來了，變成冬天難得的熱天氣，四個人人都脫掉大衣。過一陣，陳君發現黃君雖然脫了大衣，卻空著手走路，而黃太太帶著自己的和丈夫的厚重大衣。陳君說黃君：「不行呀，怎麼讓太太拿那麼重的大衣？」，可是黃君卻不動聲色地答「那，我為什麼娶了太太啊？」

二十七. (A. 利比尼羅維奇 (A. Lichnerow-Wich, 1915-))

簡介：利比尼羅維奇跟我一樣，都是埃利·卡當的弟子，算年代，他是我的學弟。歷任史得勒斯堡教授，巴黎大學教授，他如今是法蘭西研究院教授，法國科學院院士。他的專長和我都是同方向的微分幾何學。在日本開過國際性數學教育會議時他來過日本。

1. 法國地下遊擊隊(moquis)的一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方始，德軍入侵法國境內時利比尼羅維奇在史得勒斯堡大學擔任教授。史得勒斯堡離德國國境很近，一下子史得勒斯堡大學就在德軍管轄之下。在這以前利比尼羅維奇已經脫離史得勒斯堡市，成為地下遊擊隊 Maquis 的一員，大事活躍起來。諸

位可能都知道這個 Maquis 吧？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德軍佔領之下的法國，躲在山中等處與德軍展開猛烈反抗活動的地下組織的名稱。

戰後初次在波斯頓開國際數學家會議時我遇到他，我想慫恿他說，便問：「做為 Maquis 的一員，你必定有許多英勇故事吧？」，可是，他卻不願多談。

2. 巴黎大學榮譽教授

戰後不久利比尼羅維奇君受聘於巴黎大學。不久法蘭西研究院又問他要不要去當教授？

法蘭西研究院據說是 1530 年法蘭索亞一世在巴黎為振興人文教養的演講而設立的機構。我在巴黎留學時那兒差不多都由巴黎大學退休後的老大牌們所佔據。那裡沒有學生，教授們只要宣佈什麼時候想做什麼演講就可以。由於是公開的，誰都可以自由去聽講。不過，在有學生的巴黎大學的課堂也是公開的，家庭主婦也可以去聽課。

在二次大戰後法蘭西研究院似乎不再由大牌老教授，而是由一群造詣深厚的教授們所取代，以期發揮沒有學生的研究機構的能力到最高程度。

要請利比尼羅維奇教授來法蘭西研究院他們所開出的條件是：「在一年之內，在你自己喜歡的時候，做總共二十四個小時你想講的演講就可以。」

在巴黎大學當教授授課時間一定要多得多。一些雜事也免不了。於是利比尼羅維奇君

當了四個月巴黎大學教授就轉任法蘭西研究院。

1954年我被邀參加安利·波昂卡雷百年冥誕的演講會時到了久違了的巴黎，也見到利比尼羅維奇。跟他談天時，他告訴我這些話，他蠻得意地說：「對了，我成了巴黎大學的榮譽教授。」算一算他當時的年紀才三十九歲，這個年紀就當巴黎大學榮譽教授的確稀奇。

日本也有榮譽教授的制度。授與這個稱號的資格因各大學而異，一般都很複雜。大概是，任教某大學若干年的教授，經過該大學董事會全體投贊成票後才可以。他在該校當副教授的年資和在其他大學任副教授與教授的年資的算法等，每所大學都有一套細則。

而巴黎大學的規定據說是：即使只當過一天巴黎大學教授，他辭職時他所屬學院的全部教授們開會商討是否給他榮譽教授稱號。

就這樣，利比尼羅維奇君因巴黎大學理學院全體教授的推薦之下，雖然只當了四個月教授，仍然被授予巴黎大學榮譽教授稱號。

說這種話不知妥不妥，不過利比尼羅維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參與抵抗德軍而名噪一時的 maquis 的一員大事活動過的事實，讓一般法國人對他很有好感。就如二次大戰前頭腦外流到美國的 C 氏，戰後表明願意回巴黎大學的意向時，由於在法國危機時他沒有和國家共患難而成爲一個棘手的難題。

3. 英語是彌永教授的；發音可是我本人的

當我戰前在巴黎安利·波昂卡雷研究所留學的時候，法國人會說外語的人非常少。不

過數學論文主要以英、德、法、意文寫成，所以當時的數學家至少當然具有這些語文的閱讀能力。另一方面法語是有一種國際語言的模式，法國人受邀在外國大學或研究所演講時一向無礙地可以用法語說。因此，法國人有必要會閱讀外文，但是無需會講外語。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勢大變，如今具有國際語言的格的是英語。又因飛機的航線四通八達，學者間的交流比從前頻繁許多。法國教授們常常有機會被邀請到美國的大學或研究所當客座教授，因此法國教授之間英語流暢的人也就多起來。像安理·卡當氏，他是我留學巴黎時代的老師埃刀·卡當先生的長公子。就我的聽力來說，我覺得他說起英語來跟美國人沒有兩樣那般好。

說起安德列·利比尼羅維奇氏，他雖然有幾回被請去美國用英語講學，講稿也被出版多次，書寫的英文很棒，但是說句不客氣話，他的英語不如安理·卡當氏高明。

我雖然說這種話，過去我曾經也度過說兩年法語的日子，但是自從那以後只有機會寫，沒機會講的情況之下，如今說法語我覺得蠻頭大的。因此，利比尼羅維奇氏跟我的會話一下子英語，一下子又法語的，很奇怪。不過我覺得，他不習慣英語的原因之一是法語與英語有非常相似的單字，如大學 (university) 法語唸成 yniversité(字 université)，而英語是 jùinivɔ̃ːsiti，他講英語的「大學」時起先以英語的方式唸成 jùinivɔ̃ːsi 最後又想起法語的拼字，就整個字唸成 jùːnivɔ̃ːsite，讓聽者一愣一愣的。

這是數年前日本開數學教育研討會時的事。利比尼羅維奇也受邀參加，做有關數學教

育的演講。主辦者認為日本的小學、中學、高校的老師們雖然還懂得英語，法語可是不行，就請利比尼羅維奇氏以英語演講。

於是利比尼羅維奇先生以法文寫講稿，請彌永昌吉先生翻成英文。彌永先生通曉英、德法語是出了名的，因此在國際數學家團體、國際數學聯合、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等機構他都擔任過幾次職務。

終於演講要開始了，利比尼羅維奇氏把上面的原由說給聽眾聽後講：「現在要開始說的英語是彌永教授的，發音可是利比尼羅維奇本人的」，這樣讓大家笑過後，大概準備得很充足吧，他以日本教師們也都聽得懂的英語完成了一場精彩的演講。

—本文譯者任教於輔仁大學數學系—